

■新作聚焦

张锐锋《古灵魂》：
历史镜像中的文体探险

□李林荣

《古灵魂》200万字的恢宏体量和精工细作，不仅在散文创作领域冠绝一时，而且在类似题材的小说和非虚构纪实等其他各种体裁领域，也殊为罕见。它的分量意义已经超出散文文体的边界。

三十年锤炼、十年磨砺的文体探索实绩

早在1996年，张锐锋就写了一部20万言的长篇散文《别人的宫殿》，1997年首发于《山花》杂志，随后一年又在北京昆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可能因为当时整个文学界和文化舆论都开始更多地关注眼前的社会热点话题，历史大散文的热潮也已趋消歇，历史题材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回归了波澜不惊的常温常态，与此相关的探索性创作也不再容易广受重视。

恰如其副题“六十二双眼睛中的孔子”所示，《别人的宫殿》是用多点位、多重深透的鹰眼视角和描写加阐释的新潮形式，重述了当代作家和当代读者心目中的中华文化主流传统最具标志意义的孔子的一生和孔子与他学生相处的各种见诸古籍记载的关键细节。从《别人的宫殿》到《古灵魂》，明显有着一脉相承的痕迹和顺势而出的线索。但在《别人的宫殿》的延长线上，《古灵魂》展示了把握题材和旨趣立意愈加宏阔、愈加细密的新气象，在移步换景的话语形态转换和人物心绪的内在式描写等方面，整个作品的文体探索姿态也因之显得更突出、更带有雄图大略的磅礴气概。

是散文但不只是散文，更是超体裁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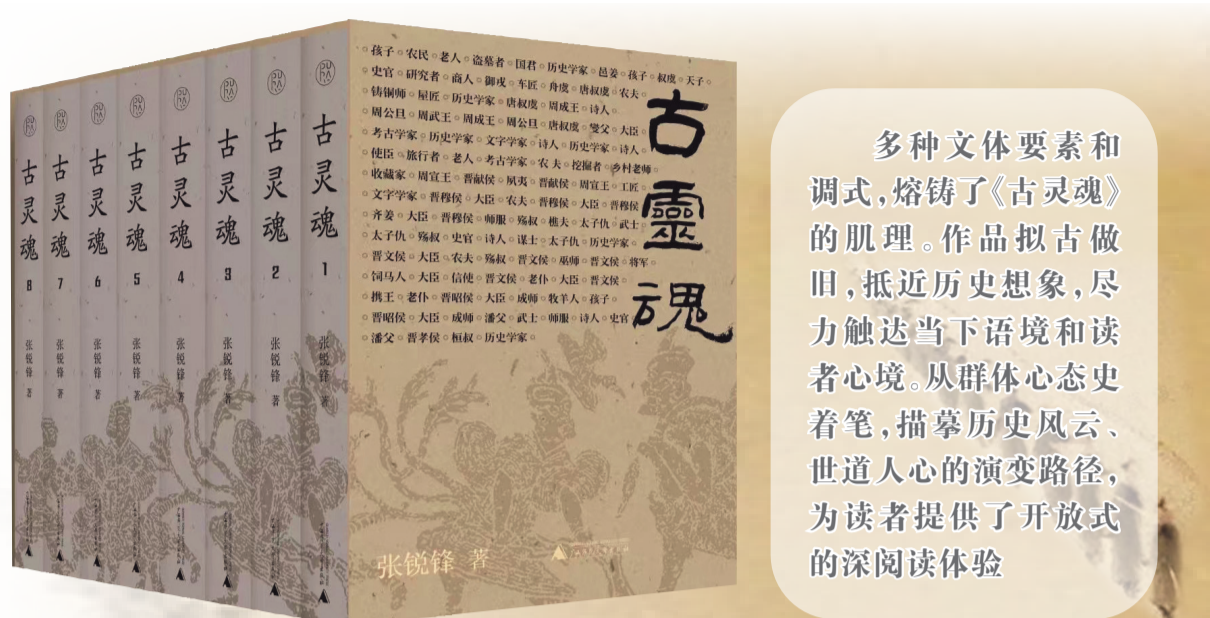
从《古灵魂》面世到现在，包括张锐锋本人和很多读者，都只是把它放在散文范畴来谈。当然，我们应该尊重作者的意见。但就文本的实际形态和品读它的实际感受而言，《古灵魂》虽然是散文，却又不仅是散文。张锐锋倾注在《古灵魂》中的创作技艺和创作经验是全面综合和全方位融会的。来自各种文体的要素和调式，包括诗歌和狭义的散文，还有戏剧和小说，都参与了《古灵魂》的整体构建，熔铸了《古灵魂》的肌理。

只不过在话语风貌上，《古灵魂》摆脱了典型化的情景描绘和性格化的人物语言这些对于传统历史小说似乎必不可少的套路设置，取而代之的，是先锋小说或先锋戏剧式的超个人视角下的角色自白的集束连缀和大规模蔓延，朝着四面八方推动起叙述腔调的澎湃语流，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饱满、外形壮观的足以涵盖晋国657年漫长历史和由此牵动的西周社会曲折幽微的兴衰脉络的全景架构。

如果把《古灵魂》看成散文，那么我们需要需要对常规的散文文体做一些定义上的更动，否则不太适合这个作品。如果把《古灵魂》看成小说，那它又不像常见的小说那样，是用一条或多条线性情节链条构筑起来的一个系统化的故事结构。它远未拘守单一的体裁规矩，更多地显示着跨体裁和超体裁的特征，以第一人内心独白贯穿始终，从文本结构的意义上对传统散文和历史题材小说实现了双重突破。

是历史题材，更是响应当代语境的代表作

28年前，张锐锋在《别人的宫殿》里，以类似《古灵魂》的方式，加工过孔子与与孔子相关的种种史料典籍文献的素材。然而，该书后记第一句话却是：“我事实上对古代的人与事不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全身心地关心现实生活的人。”这显然在提醒读者，他写这本书不是想介入到史学、文学或孔子研究等专业领域，而是为了回应那些



《古灵魂》(全8册),张锐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2024年5月

满关切现实，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去重新体验生活、增加生活经验。虽是“古灵魂”，但它仍然是对人的一切言行作为和情思逻辑具有统率和支配作用的灵魂。并且正因为“古”，它植根更深、牵连更广，历代国人的精神世界底层都跃动着它的踪影、奔涌着它的能量。

《古灵魂》中的几百个人物，上至两三千年前的天子国君、权臣武将、田夫野老，下至当代乡村的农人小孩和木业专攻的专家学者，尊卑贵贱，男女老幼，贤愚正邪，五行八作，形形色色，鱼贯而出，盘旋往复，一个个登场亮相，一番番事迹道白。合观之下，这个小社会、小宇宙似的文本内部世界，正仿佛一座规模庞大而又曲径通幽的历史镜像阵列，关联映照应当今有可能走近古灵魂，继而踏上深度探访内心世界之路，以体察古人的方式重新发现和认知自己的众多读者的不同身份定位和不同心态取向。这种群戏集簇和众声喧哗的结构样式，既为拟古做旧，逼近乱云飞渡的历史想象场景，更为尽力触达斑斓多姿的当下语境和杂色纷呈的当下读者心境。

演绎的不仅是晋国，更是西周和春秋

《古灵魂》所描绘的这段贯穿了晋国兴亡流变故事的西周衰落史或春秋终结史，已无第一手记载存世，典籍中仅见星星点点的人事梗概连缀成篇的编年述及和纪传片断。纵使辅以考古发现的器物观察和后世行文的考证结论，也远不足以支撑起一道完整深切、生动细腻的史叙事体的景观。张锐锋创作《古灵魂》的过程中，对这些史料做了一网打尽的搜罗、归置和细读。他一方面悉心维持和着力强化史料信息的精确性和历史情境的合理性，一方面对失落史料间缝隙的人物心理活动关键细节，做了精密扎实的想象填充和鲜活刻画，最终让史书记载中的缺漏、模糊和空白，汇合成了一个巨大的想象飞升和精神扩张的空间。

升腾在《古灵魂》里的这一文史交织、虚实相生的艺术空间，给张锐锋创造了当年在《别人的宫殿》里没能充分实现的那个梦想落地成真的机会。毕竟，系于晋国650余年兴亡历程的西周转折衰落和春秋终结成熟的历史进程，才是《别人的宫殿》里的主角孔子及其弟子们的精神和文化人格逆势而生、抗争而进的原发情境和时空背景，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人从精神世界的更深处审视自己的人格渊源、把握自己的魂魄底色的更实在、更立体的历史认知参照。按雅恩贝尔斯的话，《古灵魂》穿梭其中的那段远逝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瓜熟蒂落、

大幕落下的历史定型期。

依史学界的通行认识，所谓春秋向战国的过渡即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节点，三家分晋就是整个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形态和社会伦理形态演变史上的醒目转折事件。西周各个分封国中最早积蓄起强大实力的晋国，在周王室由盛而衰的五六百年间，每逢周王室宗室陷入窘境或面临危机之际，都当仁不让地扮演了独一无二的勤王辅政、重整秩序的擎天柱再加仲裁者的关键角色。因而，从各色人等的自我观照和彼此观照的群体心态着手，来刻画晋国的兴亡流变，其实也就是在为整个西周至东周的划时代转折、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风云推移画魂摄魄、钩沉索隐，描摹世道人心的演变路线。

如棋盘落子、似扇屏徐展的开放式深阅读

一个面对深广无边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气定神闲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强大而又通透的散文话语主体，从《古灵魂》中矗立了起来。1935年，郁达夫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写的导言中曾提到，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现，“五四”前后兴起的现代散文最突出的特质是前所未有的强劲个性表现。但在这一时代所能发现的个性和所能表达的个性，主要是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文化传统的网罗里挣脱逃逸的出走的个性和悖反的个性，是背对历史传统和远离历史传统的个人和个性。而《古灵魂》所展现的主体，则是一个相对于“五四”散文所发现的个体抗争者和叛逆者而言，身段更柔韧、姿态更灵活、精神更健朗、气魄更旷达的个人。他能够步入历史深处，穿越千年不朽的文化传统的堡垒，优游往返，进退裕如，腾挪于须臾之间，辗转于幽明之际。

单看200万言的厚重篇幅，《古灵魂》似乎与轻阅读、浅阅读的流行时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古灵魂》像拼图又像扇屏似的篇章结构和仿佛棋盘落子般的行文肌理，提供了一种非常友好的开放式阅读的便利。书中处处是入口，从任何一卷、任何一页、任何一段开始，都随时可以进入正序逆序皆无所碍的顺畅阅读。因为它的每一个片段都宛如一出微型的独角戏，都是一位主角上场，展开浮想联翩的自我表白和四面八方的探询求证，都是可以自足自立的相对完整、相对明确的一个叙事单元或一个戏剧桥段，就像一盒拼图中的一片、一组扇屏里的一面、一盘棋上落了一子。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关注

李怡兄说我要写一本书，在某个有酒的场合说起。

他不喝酒，我与其他人喝。他只是笑着说，一如既往，话多，语速快。总能说得有理有趣，很下酒。等我喝到酣处，他说要写一本书。我说，不是写了好多本了吗。他说这书有点不一样，随笔，回忆性质，你要写序。酒过三巡，加上语速快的话似乎更有说服力，我就答应了。听他说构想，是我最喜欢读的那类文字，是求学记、问学记、师友记。我出身偏僻，上学少，乡下学校的老师为人善良质朴，学问则就未必有多好了。所以，我爱读学者写的这一类书。喜欢里头的学问和情趣，还加几分羡慕。

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怎么做一个读书人，多是从这一类书中得来。

有酒壮胆，当时就一口答应了。酒醒时已经忘记。但李怡兄没有忘记。过一阵子重提此事，我一拍脑袋，想起来真有这回事。想推脱，却不够了。李怡还安慰我，不急，慢慢写。他自己也正在写。

这一来就放心了。我想，你写吧，慢慢写，写到猴年马月，忘记了，这事就算过去了。这样的事不是没发生过。当今之世，拖一拖，好些事情就过去了。单说写作这件事，有规划的人多，真正能完成的人并不太多。

不想这个人，说话快，写起来，上手也快，某一天，就发了若干篇章过来。读过几篇，求学问的经历，从某一件小事，忽然开眼，又从某一情境，恍然醒悟。写来有趣，有些情境，也是自己也亲历过的，读来就十分亲切。

我比李怡，年纪稍大几岁，但少年时代，都从上世纪荒年代生活过来。幸运的是，青年时遇到改革开放，本要在农村胼手胝足，不意间，求学之门豁然洞开，从此入了另一片天地，语词为骑意为马，得以畅游在另一个世界。于是觉得这篇文章也写得。

不想，他还另有埋伏，再发一个文件来，发现不止是他一个人的书，而是“60后”学者的一套书，命名为人生随笔。作者有赵勇、吴晓东、王尧、王兆胜、杨联芬，加之李怡自己。这些人，隔当代文学近些的，一年里也会见上一两面，比如王尧，前不久还在杭州一所大学《收获》杂志的活动中，看他摸着吴地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从容主持颁奖典礼。更多的人，却连面都没有见过。好在爱读书，都读过他们好文章。读过，还喜欢。认真的专著不说，即便是一篇短文，都透出他们有师承、成系统的学问。不像我，书路子读书，拉拉杂杂，最终都还是只学得一鳞半爪。要我为他们的书作序，真就叫佛头着粪了。

我是“50后”，且是“50后”的尾巴，若晚生一年，也是“60后”了。和他们经历的是同一个时代。无论向学的经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面临更宽幅面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其间所经历的文化激荡与知识谱系的构建，都很多相似之处。在此过程中，所有获得与遗憾，也算是庶几近之了。

中国学者不例外，爱做严肃的传记。如卢梭写《忏悔录》，因为太严肃了，那种真实反而并不真正真实。当然，也有例外，南唐诗人聂鲁达自传《我承认，我历尽沧桑》，其写法，就颇为亲切自然，所呈现的人生片断涉颇多，个人情感与信仰、国家政治与经济，特别是作为一个诗人，那些著名篇章的生成，读来亲切有趣，使人受益良多。

近百余年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也历经沧桑。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不论是有名的师长，还是求学的生徒，将个人经历融于国家命运，将一己思索系于文化流变，所关心的内容更加深入，每一朵情感与智慧的浪花都是时代大潮的某一面相。所以，相较于古人，我更喜欢读这一时期文化人的种种随笔，师友同道，共求新知，共探新路，切磋琢磨，聚合离散。看似写在人生边上，其实反映时代在变迁中的动荡，社会在动荡中的变迁。自此，现当代中国学者相较于古人的人生书写已然大变；感慨兴亡，却不再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偏于意趣；搜奇志怪，也不再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微言或有大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革命和改良，论而起行，何等激情张扬，何等忧思深广。抗战时期，延安、重庆、桂林、昆明、李庄……学者们毁家纾难，跋涉千山万水，在流亡中图存，在漂泊中振作，种种弦歌不辍，读书种子不死，中国不亡。

这样的风云际会，留下那么多真情文字，相较于大而化之、试图建构宏大叙事的历史书，读来更亲切自然，更生动真实，是一个时代无数面生动的侧影。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学养的渗透、有求学问道的追求，便显得有理有趣，这是文章大道，“道理则理趣浑然”。这还不算，还要加上，“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所有这一切文字，都来自前辈学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幸运是得以在青年时代重新启蒙，以问学求，以学解问。“苟日新，日日新”。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变动不居的不仅是学术，更强大的是社会现实，是历史惯性。这一代学者的种种追问、种种回顾、种种坚持或改弦更张，都是面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都要思考，中华文化从何而来，又要往何而去。这也决定了一个学者还必须选择在旧文化冲突交融中，在现实考量与学者本分间，如何安身立命。

这样的外境、这样的经验值得记录，值得形诸文字。以前也不是一点没有，但总是过于零星了。所以，这一回，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版这一套书，黄立新社长也和我说过。我说，好啊，这一代也开始回忆了，这一代人也该开始回忆了。这一代人幸逢国策易、民族新生，也曾风云际会，该留下这一时代学者的求学问学记、师友记，我想也是一部时代大潮中的探险记或漂流记。

蒙田说：“我喜欢磨砺我的头脑，而不是装满我的头脑。”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很多书，往往偏重于装满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磨砺我们的头脑。我相信，从这一套新一代学人的书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提升自己、砥砺自己、成就自己。而我们这些暂时不写，或永远不写的大多数，也能从他们的书写中照见自己。

这一套书，是这些作者他们自己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寻路记。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

我们共同的寻路记

——略说『60后学人随笔』丛书

□阿来



“60后学人随笔”丛书，李怡、赵勇、王兆胜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新作快评

南翔短篇小说《寻找徐文龙》，《芙蓉》2024年第5期

“寻找”的意义

□廖令鹏

出色，很快担任总工、高级技师，创建工作室，成为顶梁柱。对于徐文龙而言，时代、体制、学历带给他的，不是职业和成长的掣肘，而是心灵的痛楚，自我的失去。与无数光环和荣誉形成反差，徐文龙的内心却沮丧失落，对那张伪造的“学历”耿耿于怀，“你以前认识的那个徐文龙不在了，失联了，死了，代之的是齐工、齐总。”“我就是毕业于初中，我的真实学历死在一张真实而冰冷的初中毕业证上……”

《寻找徐文龙》既让我们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具有先天禀赋的技术人才如何突破时代、野蛮成长；90年代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民间科技人员和发明家如何创业致富实现个人的价值；时代的动荡如何给优秀人才（群体）带来冲击，造成无法磨灭的印迹；也让我们看到21世纪的今天，仍有无数中国家庭正艰难地徘徊在基础教育的十字路口，深陷教育“内卷”和“学历崇拜”。小说提出了一个冷峻的社会问题，像徐文龙这样，学习能力强，喜欢发明创造，擅长解决难题，综合素质高的技能型人才，假如他不擅长考试，“不会”考试，或者在一考定终生的社会机制中“拐脚失蹄”，成为一个“低学历”的技术人才，那他怎么办？《寻找徐文龙》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映照和打通，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和社会不断进步，“学历之难”竟然也

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成为一代代人的心灵哀歌。像这样的重大题材和社会共同处境，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主题，作家理应义不容辞地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忧患人民的忧患，敲响沉重的警钟，用力呼喊甚至“呼救”。

《寻找徐文龙》虽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一点也不说教和呆板，很有“南翔味道”。首先是“我的亲历，然后文学”与他践行的“三个打通”：“自己的经历和父兄辈的经历打通、历史和现实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这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次是主题的隽永。小说并没有将徐文龙塑造成一个时代楷模、成功奋斗者，或是讲述一个励志型故事，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的小说，传递了精神价值的意义，彰显了作家介入生活的主动性。“寻找”的背景、对象、起因、过程、结局的不同，还给小说创造了丰富的空间，令小说更加隽永悠长。最后是艺术性地处理“三大信息”。南翔的创作追求“好作品要有三个信息量”：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创新的审美信息量。《寻找徐文龙》的语言雅致从容，贴着不同的人物去写，收放自如，避免了“信息堆砌”和“信息茧房”，同时在细节描写、气氛铺陈烘托上也下足功夫，增加了信息的“色彩”和“弹性”，增强了叙事张力。

(作者系深圳评论家)

